

唐才子傳校注

孙映達
校注



唐才子传校注

孙映逵 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季寿荣
责任校对：易小放
封面设计：康新声
版式设计：王树敏

唐才子传校注

Tang Caizi zhuan jiaozhu

孙映逵 校注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河北省遵化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2.75印张 760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册

ISBN 7-5004-0478-3/I·56 定价：17.8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珍贵善本遵义黎庶昌珂罗版影印元刊《唐才子传》十卷本为底本，用台湾影印的《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等七种版本作本校，参考其他史籍作他校，校勘精审。以笺注结合的方式，对原书所援的史实出处作了考辨·补正，较难较僻的词（字）、典实均有简要注释。还汇集了较重要的历代对书中诗人的评述和原书未及的史料，供读者参考。书末附有两种人名索引及传主的别集著录情况简表，检索方便。

序

傅璇琮

我与映逵同志，就古典文学研究来说，是同行，就对《唐才子传》一书的整理来说，又曾是合作者，——由我承乏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映逵同志除了撰写岑参传的笺证外，还承担了全书的校勘工作，正如我在该书的前言中所说，由于映逵同志的细心校阅，使得这部书在文字方面有一个扎实的依据。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共四册《唐才子传校笺》，是集国内有关专家之力协作完成的，因为要对书中将近四百位诗家传记作笺证，无异是对绝大多数知名的唐五代文学作家考索其生平事迹，提供其基本线索。这是一项大工程，根据我们现有的学术状况，靠一人的力量要在短期内完成是不可能的。我的本意，是想通过笺证，总结和体现我国唐代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关于诗人传记研究的成果，显示唐代文学研究在一个方面所达到的水平，而这种水平是应该得到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这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希望今后唐代文学研究更有一个材料上的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映逵同志又独立进行了对《唐才子传》的校勘、注释、补录和辑评，在全稿完成、交付出版之际，他要求我写一篇序言。前面说过，作为同行和合作者，我当然义不容辞，但面对映逵同志以过人的毅力和辛劳，本该由群体来作而却由他一人毕功的这部著作，我觉得他人的任何序言都是多余的了，他为这

部唐代文学著名文献所作出的业绩已经足够说明，撰著者在学术领域中是怎样的一位勤奋的追求者。不过我还是想借此机会，谈谈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繁杂，又由于我即将去国外进行一段时期的学术访问，限于时间，我不能通读全稿。就我所读过的，我觉得映遼同志所作的工作是切实的，对于一般愿意深入了解唐五代诗人及其作品艺术风貌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十分有用。校勘细致而不繁琐，注释、补录简明确切，对前人记述的疏误所作的纠谬补缺，时有胜义；辑评部分着重搜采后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似更切合原书的特点。这使我想起1984年12月，我与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的一些同志在一起，因为着手编纂一部大型的工
具书——《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商得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同意，邀请有关的研究者在厦门开会。会议期间，我与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吴汝煜同志谈起为《唐才子传》作笺证事，我说笺证可以分头写，而校勘只能一人作，我自己来作不免费时费事，不易见效，颇以简选合适的人选为难。当时汝煜同志就向我介绍了映遼同志。吴汝煜同志我是先读了他的文章，然后才认识的。我们在厦门是头一次见面，一见之下，我感到这真是一位恂达君子，文如其人。由于他的推荐介绍，我也就信赖了映遼同志。后又听说孙望先生是映遼同志的研究生导师，而孙先生则是我素所敬重的学术前辈。每一次我因事路过南京，去看望他，都有如坐春风之感。前些年孙先生结集他的旧作，题为《蜗叟杂稿》出版，书前题记的结束语特地写上这样一段话：“本集所涉及到的几个问题，就我所知，都已有学者专家继续作出了深入的卓有成果的研究，如段熙仲先生著《古镜记的作者及其他》，王运熙先生著《元结集和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傅璇琮先生著《韦应物系年

考证》和卞孝萱先生著《元稹年谱》等便是。这些学术著作，其中很多论点与考证足以订正拙文存在的缺失与错误，览者倘分别阅读各位专家的论著，自能发现，恕我不再在此一一加以说明了。”在自己的著作集中一一指出别人论著的长处，加以赞誉，并请读者与己之所作加以比较，这种学术上的坦诚与谦虚，真如光风霁月，何等感人！我深深觉得，老一辈学者传给我们的，不止是术业，更重要的是学风。后来在接触了映遼同志之后，我也确实感到，他无论为人和做学问，也真象孙先生，质朴、敦厚，脚踏实地地耕耘着自己的那一块土地，而终于有所收成。

我后来就把《唐才子传》全书的校勘托付给他。他很快写了校勘凡例给我，掌握情况非常全面，版本源流讲得清清楚楚。但后来实际做起来却并不快，其间我又把中国科学院所藏的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内阁文库藏书（“五山版”）复印了一份给他，他又重校了一遍。这些都可见出他的认真和审慎。我现在常常感到，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学问，掌握理论当然是不可少的，吸收一些新方法也是需要的，但我们还应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学术土壤，要有传统治学方法的训练，这是一种基本功。校勘就是这种基本功之一，而目前恐怕是很不为人所看重的，不但不看重，大有鄙夷不屑一顾的样子。且不说清代学者段玉裁的那句名言：“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断其立说之是非。”（《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我们只要粗略地算一下，从两宋的余靖《汉书刊误》、岳珂《刊九经三传沿革例》、方崧卿《韩集举正》等书起，一直到清代以至近现代，前人曾撰写了多少学有根柢的校勘专著，这些专著的校勘实例以及总结出的校勘理论，我认为其意义不仅仅是对古书某些字句的校误补缺，而是学术史上长期积累形成的一种求实学风。南宋人彭叔夏在其《文苑英华辨证》的自序

中说：

叔夏尝闻太师益公先生（按：指周必大）之言曰：“校书之法，实是正，多闻缺疑。”叔夏年十二三时，手钞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之源。”缺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

《文苑英华辨证》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校勘名著，它通过分类实例的辨析而得出的某些概括，已不限于校勘学，“实是正，多闻缺疑”，对于作学问，特别是有志于搞中国古代学问的中青年学者，仍然是有启发的。目下新说迭起，引人注目，我希望不要因此而把我们固有的经过历史考验的好的治学方法丢弃了。映遼同志在《唐才子传》校勘上所作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它们决非属于如有些人很喜欢说的将被“更新”之列的。

我在为《韵文学刊》第一期所写的《创刊词》中曾提到陈寅恪先生的一篇文章（《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载《寒柳堂集》）。三十年代初，朱延丰就读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时，曾将其所著《突厥通考》请陈寅恪先生审正。当时陈先生对他说：“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就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这里可以见出前辈学者对后辈的严格要求，而且可以感到他们对着述一事是如何的审慎。“十年磨一剑”，这本来就是中国古来创作和著述极端谨严的传统学风。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应该以这种谨严的学风大力开展专书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象《唐才子传》那样有文献价值的专书是不少的，对于这些专书，需要我们化实实在在的功夫

一个一个地加以整理和研究。感想式地或者掇拾一些新名词糊弄一番，是无济于事的。它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无益于真正的学术事业。我始终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固然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样有悠久的历史，我们需要有中国文学创作史的著作，同样需要有中国文学研究史的著作。我们应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历史的审视，这样可能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学术背景。也就是说，要开展对研究的研究。这样的一种研究过去是被人们忽视的，今后可能会提到日程上来。如果我们对每一历史时期研究的概况进行具体切实的研究，譬如说，每一时期对前代文学的研究提出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这一时期又产生过哪些有贡献的学者和著作，这些人和书在整个研究史中的地位如何，一定时期的研究风气又是如何，有哪些成就和不足。如果我们这样来进行工作，就会大大丰富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开阔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开启后学者的心智。而要进行这样的学术史研究，就要有专书的整理和研究作为基础。我曾经在另外的地方写过，专书研究是最能考验著作者的功底的，这也是提高我们整体研究的有效途径。在提倡学术史研究的今天，那末象映逵同志所作的《唐才子传》校勘、注释、补录、辑评那样的工作，学术界会是多么需要，不是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吗？映逵同志正富年华，他定能率精锐之卒，再次开辟新的疆场，这或许也是我这篇短序所寄寓的一个小小的期望。

1987年9月24日 北京

前 言

《唐才子传》十卷，元人辛文房撰，是一部唐代诗人的传记专书。本书有传记二百七十八篇，连同附带论及的一百二十人，共述评了初唐至五代比较重要的诗家三百九十八人，大致按时代、及第年先后排列。各篇内容一般包括传略、诗评、著作流传情况和附论四部分。

在辛文房以前，没有唐代诗人传记专书。见录于两《唐书》、《文苑》等传的诗人很少，传记也往往很简略。绝大多数唐代诗人名不见史传，甚至大名鼎鼎如李颀、岑参、储光羲、刘长卿、皮日休、杜荀鹤等人，亦在摒弃之列。不少诗人的生平资料，东鳞西爪，零星散见于唐宋人的诗文集、笔记、诗话、书目提要等书中。南宋人计有功编纂《唐诗纪事》，内容繁富，保存了很多唐代的诗歌文献，但罗列杂乱，是资料汇编的性质，对唐代诗人有名必录，超过千家，但辑录的资料并不完备。至元代，辛文房复博采群书，对纷然杂陈的各种素材加以排比取舍，考订印证，重新熔铸，精心结撰，成《唐才子传》十卷。本书自成体例，容纳了大量的诗人传记资料和诗歌评论资料，使得很多史中无名的诗人的事迹不致湮没无闻，成为第一部系统述评唐代诗人生平和创作的专门著作。此书问世后，艺林称便，至今仍是研究唐诗的重要参考书。不少旧闻，因史籍散逸，赖此书得以保存。《粤雅堂丛书》本《唐才子传》伍崇曜《跋》有云：“其书评隲精审，似钟嵘《诗品》；标举新颖，似刘义庆《世说》；而叙次古雅，则又与皇

甫谥《高士传》相同。”虽属溢美，却能指出本书的一些特色。

辛氏采摭资料的范围很广，取材也比较可信。首先是正史，采录《新唐书》较多（在二百七十八篇传记中，有八十余篇取自《新唐书》列传、附传，四十余篇采录《新唐书·艺文志》的附注）。对正史本传并不全文照录，仅节写其生平大略，并据他书补记逸事，以见人物的风貌。此外，辛氏很重视第一手文献，据以对史料进行增补和修订，以求信实。作家本人及唐代人所写的自传、别传、集序、行状、碑志等，皆尽量予以利用，如《王绩》据吕才《东皋子集序》订补，《陈子昂》据卢藏用《陈子昂别传》订补，《陆羽》据《陆文学自传》订补，《陆龟蒙》据《甫里先生传》订补，《方干》据吴融《方玄英先生传》补充，《郑谷》据《云台编序》补充，《刘言史》据皮日休《刘枣强碑》补写，等等。其次，广泛搜集、摘取唐宋人笔记史料，如《朝野僉载》、《大唐新语》、《唐国史补》、《历代名画记》、《刘宾客嘉话录》、《本事诗》、《北梦琐言》、《南部新书》、《唐语林》、《容斋随笔》等，从多方面充实传记内容。从《云谿友议》、《唐摭言》、《诗话总龟》、《唐诗纪事》中辑录尤多。宋人的书目提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也常常取材。如各类书籍均无载，则从本人诗歌及他人赠酬诗中勾稽其行止事迹，补写了不少诗人的传记，如王湾、常建、崔署、张迺、沈千运、孟云卿、康洽、王季友、朱昼等。可见辛氏为撰写本书下了很大工夫。本书又保存了大量唐人登科资料，为考订诗人生平事迹提供了重要依据。唐人登科记久佚，此项记载弥足珍贵。本书中还有一些为《全唐诗》及《外编》失收的佚诗。对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明初人杨士奇在《书唐才子传后》^①中就已经

① 《东里文集》卷十《题跋》。

予以肯定：“读其诗而欲知其人，于辛所录宜有取。”

传记中诗评部分，涉及各家诗歌的艺术成就及风格流变，“多摘摭诗家利病，亦足津逮艺林”^①。其说多取自前人旧评，如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宋人欧阳修《诗话》、敖陶孙《诗评》、惠洪《冷斋夜话》、严羽《沧浪诗话》等。传后常就诗人的遭遇、品德等发表随感式的议论，所谓“触事兴怀，随附篇末”^②，从这里亦可略窥辛文房的思想。

本书可议之处也不少，主要是运用史料的失误。有的是沿袭旧史之误，也有的是误解旧史致讹。《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如谓骆宾王与宋之问唱和灵隐寺中，谓《中兴间气集》为高适所选，谓李商隐曾为广州都督，谓唐人学杜甫者惟唐彦谦一人，乖舛不一而足。盖文房抄撮繁富，或未暇检详，故谬误抵牾，往往杂见。”如此之类尚多，如《大唐新语》记张说论宋惠问等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本书（卷一）误从《郡斋读书志》记为徐坚之论；《郡斋读书志》记柳仪曹（宗元）评陈子昂语，本书（卷一）误为柳公权评；韦应物贞元间官终苏州刺史，而本书（卷四）误从《补韦刺史传》谓“大和中以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唐摭言》记施肩吾“上礼部侍郎陈情”，本书（卷六）误为“谢礼部陈侍郎”；杨亿《谈苑》记吴融论卢延让诗，本书（卷十）引述，误以杨亿语为吴融语，等等。本书节录旧史之处，也间有割裂原文之弊，因叙事过简，或顾此失彼，或前后颠倒，不能衔接。书中荒唐之说、陈腐之论亦时时可见。书中所记诗文集流传卷数，往往是照录史志和宋人书目，有的不一定可靠，甚至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唐才子传八卷》条。

② 《唐才子传·引》。

将《郡斋读书志》著录雍陶集时所云“《唐·志》（按：指《新书·艺文志》）集十卷，今亡其半”误记为“有《唐志集》五卷，今传”。书中又常记“有集今传”，有的看来仅是推测，不一定有根据。如王泠然、刘昫、薛据、郑虔、沈千运、孟云卿、冷朝阳、马异、陈上美、任涛等人的著作，唐宋以来的史志、书目均未见著录，元时是否有集流传，殊觉可疑。上述各点，都是使用本书时应该注意的。当然，对此书进行整理、订正，很有必要。

作者辛文房，字良史，元代前期西域人，曾官省郎。能诗，与王执谦、杨载齐名。马祖常称其诗：“悠悠今古意，落落短长歌；秋塞鸣霜铠，春房剪画罗。”且拟之为阴（铿）、何（逊）^①。于此亦可见元代西域人汉化之深。有《披沙诗集》，惜已不传，仅存乐府歌行、七言绝句各一首^②。辛氏酷好唐诗，以刘长卿字为名，以于良史名为字，以李咸用诗集名题自己的诗集。因向往唐代诗家，“遐想高情，身服斯道，究其梗概行藏，散见错出，使览于述作，尚昧音容”，“尝切病之”，乃“游心简编，宅心史集”，于元成宗大德甲辰（即1304年）写成《唐才子传》，“用成一家之言”（见卷首《引言》）。辛氏《引言》中自称“异方之士，弱冠斐然，狙于见闻，岂所能尽”，又谓是书作于“端居多暇”之时；且书中多言坎壈不遇之憾，“意良史亦必负才踈弛，见嫉时流，故借著书以消其愁愤”^③，可见是他早年未仕时的著述。泰定元年（1324年）前，辛氏入朝为省郎^④，得博览秘府藏

① 《马石田文集》卷二《辛良史披沙集诗》。

② 见于《国朝文类》卷四、卷八。

③ 《粤雅堂丛书》本《唐才子传》伍崇耀《跋》。

④ 元张雨《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卷四《元日雪弄早朝大明宫和辛良史省郎二十二韵》有“岁开环甲纪”之句，泰定元年即为甲子年。

书，或又续有增补。此书当在辛氏名显后刊刻行世，具体时间尚不清楚。辛文房写了不少唐人传记，他本人的生平事迹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也是一件憾事。

《唐才子传》的版本流传情况，颇为曲折。明初杨士奇《唐才子传书后》称：“十卷，总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诗名当时。”杨氏所见当为完帙。杨氏《文渊阁书目》亦著录：“《唐才子传》，三册。”唯《唐才子传·引》谓“传成，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录不混者又一百二十家，釐为十卷”，共计三百九十八家，而较杨氏所述多一人，或系杨氏少计一人^①。明永乐年间编修《永乐大典》，《唐才子传》全书收入“传”字韵内。至清中叶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传”字韵各卷适佚，十卷单刻本在国内亦已失传^②，四库馆臣遂于《永乐大典》残存各卷杂引《唐才子传》处“随条摭拾，衷辑编次，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传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釐为八卷”^③，编入《四库全书》（简称“《四库》本”）^④。故《四库全书》八卷本《唐才子传》只是零篇断简的辑佚本，已非原貌，辑得的传文多有残缺。本中有辑佚者的夹注，据《新唐书》等史籍对传文作了一些订补。这可以算是《永乐大典》系统的本子，与另一个系统的日本流传元刊十卷足本对照，颇有异文。

元代刊行的十卷足本传入日本，流传了下来。清光绪年间宣

-
- ① 《四库全书总目》亦谓“总三百九十七人”，四库馆臣未见全书，且未见辛《引》，当据杨氏跋文转述。
- ②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二有“辛文房《唐才子传》十卷，当系据杨士奇所记著录，仅存书目而已。
-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唐才子传八卷条”。
- ④ 济宁李氏《藕墨亭丛书》收有傅增湘双鉴楼藏“稿本”《唐才子传》八卷，未见，疑即是《四库》抄本。

都杨守敬从日本访得^①，遵义黎庶昌以珂罗版影印了出来，这是目前见到的最好的版本^②。《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著录此本的底本为元刊本。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所著录之“珂罗版印明黑口本”，疑亦指此本。此本刊刻较精，讹误极少，且多保留原始面貌。他本文字多有形近之讹，如卷一《陈子昂传》“任侠尚气，弋博”（与《新唐书》本传合），诸本“弋”多讹作“才”；同卷《李昂传》“开元二年王丘下状元及第”（据《旧唐书·王丘传》，丘开元初累迁考功员外郎，知贡举），别本“丘”多讹作“立”；卷三《元结传》“始隐商於山中”（与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合），诸本“商於”误作“於商”，而黎氏珂罗版本皆不误。又如卷二《崔国辅传》：“及卢□□所遗文槐书函一枚，此物皆己之所借，宜野人□畜，特以相赠。”黎氏珂罗版本“卢”下空两格（《四库》本此处作“黄门”二字，与陆羽《陆文学自传》合），“人”下空一格（《四库》本此处作“乘”字，亦与《陆文学自传》合），两处空缺虽分处两行文字中，然位置紧邻，保存了刻版坏损的原状；而十卷本别本“卢”下只空一格，且与“人”字下空格位置完全错开。同卷《李白传》传文之末，黎氏珂罗版本附缀小注曰：“或云：白，凉武昭王暠九世孙也”，作偏行小字，与正文字体显异，应为后人所加；别本所刻则与正文无别，殊失原貌。凡此种种，可见黎氏珂罗版本（下文简称“影元刊本”）为现存各种十卷本之祖本^③。《增

① 杨氏《日本访书志》未著录，然该书目录页铃有“杨守敬印”、“宜都杨氏藏书记”、“墨吾海外访得秘笈”印章，可证。

② 此为日本善慧轩旧藏本，除铃有杨守敬、黎庶昌藏书印四方外，目录页原有“善慧轩”印一方。

③ 此本每页十二行，行二十二字，上下单栏，左右双栏；黑口，双鱼尾，均向下开；版心以“才一”、“才二”、“才三”……标出卷数；字形为典型赵体，写刻甚精。多用异体字、俗体字、简化字。

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定此影印本底本为元槧，大抵可信。

元刊《唐才子传》十卷本传入东瀛后，日人先后据以刊刻了几种版本。目前见到的最好的一种为日本南北朝后半顷（十四世纪后期，约当我国明初洪武年间）刊行的“五山版”，十卷，“审其版样，盖得元槧而翻雕之，字画精整，纒缪极少”^①。此本董康曾据以翻刻，其书未见。现有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内阁文库藏本（简称《五山》本）。此本版式、字形几乎与影元刊本完全一致，唯笔锋刀法、边框缺损各异，确系据元刊本影刻。又，日本正保四年丁亥（1647年，清顺治四年）上村二郎卫门刊本，十卷，此本内容亦与影元刊本同，汉字旁每注以日本假名（即所谓“训点本”），唯错字甚多，系属天瀑所云“坊刻颇多舛讹者”之一种。因刊印较早，仍有其价值（简称《正保》本）。国内可见者为丁丙八千卷楼旧藏，附有丁氏手书题跋签纸，今归南京图书馆。兹录丁氏题跋于下：

《唐才子传》十卷日本刊本

西域辛文房撰。文房始末不可考。其卷八题辛良史撰，当为文房之字。卷首自引，题有“元大德甲辰春”，则为元时人。陆友仁《研北杂志》称其能诗，与王执谦齐名。杨士奇《东里集》有是书跋，是明初尚存中土也。录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录不泯者又一百二十家，皆以时代为次，时代之中又以科目先后为断。始大业初，终五季末。继往开来，别具襟旨，伸尊黜妄，雅具体裁。评论得失，好而知恶，非徒知诵诗而不知尚论者。《四

^① 《佚存丛书》本《唐才子传》天瀑山人《跋》。

序》从《永乐大典》采辑，蘧为八卷。此则东瀛刊本，尚属原帙。厥后萧山王宗炎以陆芝荣校汪继培勘者雕于三间草堂，即是本耳。

文字与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微异。丁氏谓三间草堂本据是本刊雕，误，三间草堂所据底本为《佚存丛书》本。《佚存丛书》本十卷，系日本享和三年癸亥（1803年，清嘉庆八年）天瀑山人（林衡）据五山本以活字重印，此本排误亦多（简称《佚存》本）。该书有民国十三年（192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流传较广，昔日治《唐才子传》者多以此书为据。以上系在日本流传、重刊的元刊十卷足本系统的本子。

日本《佚存》十卷本传回中国后，学人以《四库》八卷本与之对校，先后刊刻了几种版本，以下列两种较精：清嘉庆十年（1805年）陆芝荣三间草堂刊本，十卷，附陆氏《考异》（即版本校勘记）一卷，有王宗炎序、汪继培跋（简称《三间》本）^①，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钱熙祚刊《指海》本，十卷，文中夹注校记，此本收入丛书《指海》，流传亦广。以上系十卷足本与八卷本对校过的本子。

此外，自清同治间直至民国时期，国内还有几种据《佚存》本覆刻的本子，大都价值不高，如清同治元年（1862年）南海伍崇曜刊《粤雅堂丛书》本、民国十三年（1924年）苏州文学山房木活字排印《江氏聚珍版丛书》本等。尤以清光绪八年（1880年）沪上黄氏木活字排印的所谓《佚存丛书》本，处处妄改原文，面目全非，最为荒谬，理应淘汰，免误后人（该本《中国丛书综录》有著录）。《书目答问补正》著录“光绪间清隐山房刻巾箱

^① 台湾广文书局《笔记丛编》收有《唐才子传》十卷，即据三间草堂本印。